

平台薪酬体系不透明、罚款名目多数额大。一些新业态劳动者说出心声——“我的收入怎么能拿得明白又合理?”

“我们在访谈中接触的一位外卖员说,自己所在的站点称底薪4000元,并按照单量分段计价,500单以内每单8元,单量越高,单价越高。但是如果外卖员一个月的送单量达不到500单,收入也达不到4000元。”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近日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团队经过一项调研统计发现,有超过70%的外卖员拿的是无底薪计件工资。在一些专送外卖配送中,要达到一定的单量才能拿到配送站点所声称的底薪,达不到就按单计价。

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新业态劳动者,他们普遍关心:“我的收入怎么能拿得明白又合理?”

“我怎么不知道薪酬标准变了?”

49岁的韩师傅在北京做网约车司机两年,每天清晨5点多出车,一直跑到第二天凌晨,每天平均能到手700多元,还要除去200多元的油钱和170元左右的租车费,“要想赚钱,至少得跑12个小时以上”。

对于平台抽成多少,韩师傅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也不方便问乘客每单付了多少钱,“平台抽成不稳定,抽多少咱也做不了主,一切听平台的。”

“劳动者对于报酬的获得方式、组成内容等享有知情权。”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四川伟旭

律师事务所主任杜伟接到过不少来自外卖员、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劳动者的法律咨询。他表示,平台方应当对薪酬体系组成,包括如何收取佣金等进行明示。

“对于抽成比例范围的确定,是通过双方利益博弈而最终确定的,法律上对于劳动者的保障为最低工资保护,因此抽成比例范围的确定,一是要透明公开,二是要双方达成一致。”杜伟进一步解释,“平台制定了抽成比例范围后不能随便更改,而劳动者在明确知晓平台规则的情况下,如果选择接受,应当认为其已经与平台达成一致。”

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近日对外公布的一起案例中,仲裁结果强调了薪酬标准制定的程序合法性。该案中,代司机李师傅在发现自己的工作量没什么变化、但收入比以前明显减少后寻求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李师傅说,他的工资由基本工资4000元和业绩提成构成,公司自2020年8月开始未足额支付工资。

此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表示,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保障驾驶员的合理劳动报酬,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综合考虑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工作任务以及当地的平均工资、市场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地确定驾驶员的劳动报酬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记者采访中,有劳动者表达了担忧:平台把佣金降下来了,会不会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小付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众包骑手,他告诉记者,自己拿到手的送单价降下来了。“现在下午2点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制度的制定经过了民主程序,劳动者已经知晓,仲裁员未认定公司调整工资标准的合法性,支持了李师傅补发工资差额的请求。

平台会不会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劳动者能拿多少钱、拿多拿少谁说了算?近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对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针对近期个别网约车平台上的司机反映“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造成收入下降”的问题,约谈回应“不得利用资本恶性竞争、无序扩张”“要规范定价行为,降低抽成比例”等。

此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表示,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保障驾驶员的合理劳动报酬,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综合考虑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工作任务以及当地的平均工资、市场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地确定驾驶员的劳动报酬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如果有一个新业态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那么就能确定平台从业者薪酬的最低行业标准,但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劳动定额标准。”

黄乐平说,“应该在立法上尽快填补空白,尽快确立劳动定额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样才能确定平

以后3公里内每单差不多在4.1元,而2018年最低单价是6.1元。”

河北人慧姐也是一名外卖员,她担心的是平台“以罚代管”,自己收入还是上不去。“一次没穿工服罚300元,一次工牌没戴罚100元,后台审核没通过的话,罚款500元再加停接一天的单子。”慧姐说,“专送骑手跑一次单就赚几元钱,罚款实在是太多了。”

同样的顾虑也发生在快递员身上。近日,部分快递企业陆续调整末端派费,但快递员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快递企业“一刀切”式的罚款。国家邮政局日前指出,坚决反对企业“一边增加派费、一边增加罚款”,将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内部的“以罚代管”行为。

应确立新业态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

“相较平台,从业者没有太多议价权。”黄乐平说。在他看来,目前平台从业者薪酬主要由供需关系来确定,最初平台为吸引劳动者从业给出不错的待遇,而随着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劳动者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有一个新业态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那么就能确定平台从业者薪酬的最低行业标准,但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劳动定额标准。”

黄乐平说,“应该在立法上尽快填补空白,尽快确立劳动定额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样才能确定平

台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和所对应的薪酬体系是否合理。”

杜伟认为,新业态从业者的薪酬体系制定需要结合平台自身发展、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劳动量综合确定。他进一步解释:“薪酬体系的构建,既需要法律保障最低工资标准,也需要考量行业对于从业者的需要、从业者的劳动意愿、劳动强度以及劳动可替代性等多种因素。”

“平台方应当主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或者相关的合作协议,在与劳动者构成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应当遵守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杜伟说。

黄乐平提到“从劳动关系上对平台从业者进行甄别”。他认为,不管平台采取什么用工形式,只要实质上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条件的,都应该适用劳动法的标准去实现劳动者的收入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特别是产业工会可以跟平台所在的行业协会或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来确定从业者的工资标准、薪酬调整机制。

“除了平台外,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新业态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对明显属于规避劳动关系的用工行为加以制止。”杜伟说,“工会可以结合新业态的行业特点,指导新业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并提供相应的会员服务,对于平台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法监督。”

据《工人日报》

梯田披金秋粮丰收



金秋时节,仙居县双庙乡西马村梯田水稻渐次成熟,层层叠叠的梯田披上“金甲”,与青山、村落、通村公路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通讯员王华斌 摄

新华国际时评

美国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和平破坏者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军8月底借口“反恐”在阿富汗发起无人机袭击,所击中的目标与恐怖组织“毫无关联”。报道还进一步证实,在袭击中丧生的10名死者都是平民,其中最小的只有两岁。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轻描淡写地表示,美国军方“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到喀布尔实地调查”。

这种轻慢之词恰恰表明,美国政府对生命的无视。穷兵黩武、霸凌霸道、漠视生命、侵犯人权,给世界带来巨大人道主义灾难,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和平破坏者。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说:“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在战争、奴役和屠杀中诞生、壮大并成为超级大国,其建国240多年的历史上,只有16年没有打仗。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海外屡屡发动战争,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动荡,造成极为严重的无辜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据美国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统计,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18万到2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还在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白磷弹等,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伊拉克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伊拉克癌症发病率是平均每10万人中40人,而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飙升至平均每10万人中至少1600人。

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10数事实告诫世人,美国是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的真正破坏者,是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上升的源头。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破坏全球秩序,威胁人类和平,成为威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和平发展的最大挑战。如果美国继续执迷于维护霸权,依据“丛林法则”行事,必将遭到越来越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注定被时代抛弃。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家长对减轻课后培训负担、减轻作业负担是否支持?

86.8%受访家长支持减轻校后培训负担 74.8%受访家长支持减轻作业负担

对“双减”政策更了解的家长,更倾向支持“双减”政策

对于“双减”政策,家长的真实态度如何?日前,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共有511043名家长参与。调查显示,33.9%的受访家长表示了解“双减”政策。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普遍持支持态度,具体来看,86.8%受访家长支持提高校内教学质量,同时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74.8%受访家长支持减少机械重复的刷题,减轻孩子作业负担。

33.9%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比较了解

调查发现,对于“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12.8%的受访家长表示非常了解,21.1%的受访家长表示比较了解,30.7%的受访家长表示一般,35.5%的受访家长表示不太了解或不了解。

调查发现,家庭收入处于

上游的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更高,为53.4%;从学历来看,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最高,为65.7%,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最低,为23.9%;从所在地来看,二线城市的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更高,为40.0%,乡镇和农村的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最低,为24.6%。

“我平时会通过电视新闻和家长群了解关于‘双减’的最新信息。”安徽安庆初一学生家长吴先生表示,“‘双减’政策对孩子肯定是有好处的,但也得看后续实施效果如何。”

68.6%受访家长支持提高高校内教学质量,同时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

调查显示,对于提高校内教学质量,同时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

一方面会督促学校提高课内教育

质量,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教育公平。

广东五年级学生家长贺女士担心,课外培训机构取消后,新的问题会随之而来,比如,谁来辅导孩子学习,孩子想要学习是否有途径,“希望后续的政策能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

对“双减”政策更了解的家长,更倾向支持“双减”政策

调查显示,对于减少机械重复的刷题,减轻孩子作业负担,74.8%的受访家长表示支持,16.9%的受访家长表示说不好,8.2%的受访家长表示不支持。

总体来说,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对于“减负”的不同内容存在差异。可以看到,受访家长对于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为89.2%,而孩子成绩处于下游的家长支持率最低,为82.6%。

吴先生认为,课外培训机构把教育搞得乌烟瘴气,如果不整改,教育就不能回复正轨。“对课外辅导机构整改后,孩子只能在学校上课,一方面会督促学校提高课内教育

质量,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教育公平。

广东五年级学生家长贺女士担心,课外培训机构取消后,新的问题会随之而来,比如,谁来辅导孩子学习,孩子想要学习是否有途径,“希望后续的政策能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

对“双减”政策更了解的家长,更倾向支持“双减”政策

调查显示,对于减少机械重复的刷题,减轻孩子作业负担,74.8%的受访家长表示支持,16.9%的受访家长表示说不好,8.2%的受访家长表示不支持。

总体来说,受访家长对“双减”政策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对于“减负”的不同内容存在差异。可以看到,受访家长对于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为89.2%,而孩子成绩处于下游的家长支持率最低,为82.6%。

总体来说,